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贺云翱 著

六朝文化

考古与发现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6872
12

南京大學史學叢書

南京大學人文基金項目

賀云翱 著

六朝文化

考古与发现



中医学院 0623550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贺云翱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165-4

I. ①六… II. ①贺… III. ①文化史—中国—六朝时代②考古发现—中国—六朝时代 IV. ①K235.03②K87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8335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藪。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栻、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瓦当研究篇

六朝瓦当研究缘起	3
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	12
南朝都城建康莲花纹瓦当的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	25
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	46
南京出土六朝兽面纹瓦当再探	54
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南朝瓦当及与南朝上定林寺关系研究	64
南京毗卢寺东出土的六朝时代瓷器和瓦当	82
南朝瓦制作技术的初步探讨	90
南京出土南朝椽头装饰瓦件	109
南京出土六朝椽当初研	112
“六朝瓦当”研究回顾及对若干问题的探讨	124

城市考古篇

南京石头城遗址 1998—1999 年勘探试掘简报	147
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	159
发现最早的地坛遗存——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	181
南京发现南朝“明堂”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	194

三国两晋南北朝城市考古的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	204
中国南朝都城与百济	240

佛教与域外文化篇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	257
从考古发现谈中国南方隋以前的域外文化输入	271
南京独龙阜东出土南朝石塔构件的初步研究	284
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	290
南朝善业泥像鉴赏	308
南京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	310

墓葬考古与陶瓷篇

南京梁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	315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试考	329
“曹操墓”考古发现争论概说	335
三国两晋南北朝帝王陵墓考古概说	360
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的发掘	378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	387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397
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	411
《齐故平原将军太中大夫金乡县开国侯赵君墓志铭序》及其考释	429
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	436
后记	441

瓦当研究篇

六朝瓦当研究缘起

一

瓦当,俗称瓦头、筒瓦头,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宋以后称勾头、勾头瓦。瓦当当面通常都会得到精心的装饰,装饰内容则因时因地甚至因建筑类型之异而呈现出千百变化,堪称丰富多彩。在大屋顶式的古典建筑上,瓦当所在正当檐口部位,既具有束水护檐的功能,同时因其处于墙面和屋顶坡面两个空间块面的分隔线和接点上,所以又具视觉提示和美化的功用。特别是瓦当在西周至六朝以前主要用于宫殿、衙署、宗庙、陵寝等官方高等级建筑物上,六朝时代又扩大到寺庙建筑等,因此它就具有了代表国家礼仪制度、统治阶级思想意识、时代精神,甚至还有反映城市功能分区和不同区域文化传播过程的特定价值。另一方面,瓦当毕竟出于普通艺人和匠人之手,势必也会融入民间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及制作工艺。从学术研究角度视之,在古代文化遗存上,瓦当所提供的信息绝不低于任何其他类型的物品,因此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研究古代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的重视。

早在宋代,金石学家已开始了对瓦当的摹拓和研究,明代以后,瓦当研究风习大盛,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著录瓦当或研究的专著不下 20 种。1949 年以来,瓦当不仅出土数量众多,而且大多经考古调查或发掘所得,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地层,故而相关研究成果大大超过前人。国外尤其是日本、韩国一些学者,也对中国瓦当做过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中,重点仍是关洛地区秦汉瓦当以及战国时代齐、燕等国的瓦当,汉代以后的瓦当研究十分薄弱。固然,战国秦汉瓦当从瓦当发展史上说有着起源较早、品类丰富、造型独特、图案或文字精美、礼制地位崇高等诸多特征,应当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正如所有的文化和艺术都有时代的变迁,每一时代的文化和艺术又各具独特性和不可代替性一样,瓦当也

是如此。每一时代的瓦当自然都有其鲜明的文化个性和审美的价值,每一古代都城的瓦当也有其别具的技术风格和历史意义,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研究。六朝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区域特色兴起、不同思想流派竞美、文化较为开放、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范孕育并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当然也会从一个方面反映这一时代特征。可惜,以东吴都城建业和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六朝瓦当考古研究,在当代学术史上几乎长期成为空白。所幸近年来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和民间收藏人士开始重视六朝瓦当的发现、收集和研究,有关工作成果也陆续问世,“六朝瓦当”日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包括周边国家的学者近年也不时前来南京考察,试图通过六朝瓦当观察公元3至6世纪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今后,随着六朝瓦当资料的逐步公布,其学术价值还会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认识与揭示。

二

瓦当为什么得名?目前说法不一,至少从汉代起,瓦当就自名为“当”,西安及附近地区出土的有“宗正官当”、“蕲年宫当”、“巨杨冢当”、“殷氏冢当”或“长陵西当”等文字瓦当可以为证^①。早在清朝,就有学者探讨它的得名缘由,清代程敦引认为它是筒瓦之底,故名,其证据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玉卮而无当”,注曰“当,底也”;毕沅则认为瓦当形如玉璧,“当”应是璧、珰之意;今人陈直先生以班固《西都赋》“裁金璧以饰珰”中注“珰,椽头饰也”,认为瓦当是因位于椽头之上而得名;施蛰存先生以为,“当”字即“挡”的初文,有阻挡、遮挡、抵挡之意^②。我以为,古代瓦当自称“当”者,是对筒瓦上与人们面临建筑时相对之圆形(初为半圆形)部分的特殊指称,与古代当道、当国、当事、当局、当今、当日、当户、当卢等等之“当”意近,兼有“遮挡”风雨、美化装饰(“珰”意)等含意。有“当”之瓦,应称“当瓦”,以别于他瓦,为此,“当瓦”可自称“当”,也可自称“瓦”,前者如当瓦自铭“官当”、“仓当”、“冢当”、“庾当”、“殿当”、“舍当”等,后者如当瓦亦铭“都司空瓦”、“长水屯瓦”等,其意一也,如欲全称则为“当瓦”,故汉代也有“冢仓当瓦”、“新安当瓦”铭者^③。

① 参阅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相关瓦当铭文实例,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各家诸说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③ 所举瓦铭各例均引自赵力光先生书,出处见注①。文献资料参见台湾天成出版社《文史辞源》第3册,第2122—2125页。

“瓦当”乃后人取“瓦”之泛称与“当”之特称合而为一,与古意或有差异。姑作此说,俟智者明辨矣。

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瓦当出土于西周中期的陕西周原遗址及丰镐遗址^①,此后一直绵延不绝。初为半圆形,东周时出现了圆形瓦当,秦、汉时,圆形瓦当占大多数,到了东汉时代,半圆形瓦当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从纹饰上说,西周时饰重环纹,后来出现绳纹、饕餮、云山、卷云、树木、动物、龙凤纹等。秦代,以动物纹和云纹为主,到汉代有吉祥动物图案、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云纹和文字瓦当等多种,四神纹瓦当和云纹瓦当的流行,是汉代谶纬学说、神仙思想和五行学说,特别是楚文化艺术影响的结果,而文字瓦当又反映了汉代一统天下、强化皇家权威和贵族地位的社会现实。多种瓦当中以云纹瓦当最为丰富和普及,一直流行到三国两晋时期,是六朝以前使用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瓦当类型。也可以说,在瓦当艺术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云纹瓦当,就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的兽面纹瓦当与莲花纹瓦当一样,影响了整整几个朝代。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三国两晋南北朝”与“春秋战国”时代一样,是一个孕育新思想、新艺术,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时代。

三

本书所说的“六朝”,主要是指建都于今天南京的东吴、东晋(一般还包括西晋)、宋、齐、梁、陈这六个王朝。20世纪内,对六朝都城(东吴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的考古调查工作虽然陆续有所进行,但系统的调查钻探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基本上没有开展,学者所做的六朝都城史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而进行。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其他城市如江苏镇江、扬州、湖北鄂州等地的考古工作虽然开展得较为深入,但是有关六朝瓦当的出土情况似乎也几乎未见公开报道。1994年开始,笔者在南京地区做文物调查时发现,南京的一些民间收藏人士收藏了一批南京城区出土的瓦当。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图案新异的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时,心中的震惊与好奇是强烈的,我从中看到了与秦汉瓦当体系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风格,此后,便开始了六朝瓦当资料的调查和研究。

1997年迄今,我和我的新老同事邵磊以及路侃、叶剑飞、夏堃、袁晓琪、王碧顺、

^① 岳连建:《西周瓦的发明、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

周桂龙、朱广金、王克非、刘步英等,在南京市文物局领导和市文物研究所同仁的支持下,在南京大学考古专业部分同学的参与下,投身到南京城市考古工作中,先后调查了南京市以下一些建筑工地:

成贤街南段下水道改造工程、成贤街北段东南大学建筑系新楼建筑工地、成贤街中段东南大学南门外马路(四牌楼街)东延建设工程、成贤街东侧珍珠河清淤工程、珍珠河南端东侧小贵山“华海电脑科技广场”建筑工地、珍珠河北端东侧“和平大厦”建筑工地;进香河北端西侧进香河宾馆建筑工地、大行宫南太平南路东侧云峰大厦及“都市名园”大楼建筑工地、大行宫东中山东路南侧白下区公寓建筑工地、大行宫南太平南路西侧、铜井巷北建筑工地、大行宫段中山东路北侧南京图书馆新馆建筑工地、中山东路南侧利济巷西建筑工地、中山东路明故宫段南北两侧建筑工地、长江路东端毗卢寺东“汉府花苑”建筑工地、北门桥南估衣廊西侧“估衣廊商住楼”工地;洪武南路东侧金宝花园建筑工地、洪武南路内桥东北侧“金穗大厦”建筑工地、内桥西北侧“万里皮鞋厂”南沿河商用房建筑工地、洪武南路东小火瓦巷西口下水道改造工程工地、中山南路南下秦淮河段跨河大桥施工工地、中山南路东砂珠巷小学西门外华美大厦施工工地、中山南路西侧铜作坊市工商银行综合楼建筑工地、中山南路东侧洋珠巷“国际投资大厦”建筑工地;新街口金鹰商城建筑工地、新街口南丰富路体仁大厦建筑工地;秣陵路小学旁建筑工地、秣陵路与王府大街交界处“王府花园”建筑工地;估衣廊原南京钟表元件厂旁建筑工地;建邺路北侧张府园地区建筑工地、建邺路南侧七家湾建筑工地、建邺路西端北侧止马营南京肥皂厂建筑工地;南京第四中学体育场(益山)建筑工地;赛虹桥南新世纪建材大市场(西营村)建筑工地;龙蟠南路西大中桥东北侧“杨吴城濠”东岸建筑工地;白下路金陵职业大学东侧南京电视台建筑工地、白下路南侧西八府塘地区建筑工地、白下路与长白街交界处“中天花园”建筑工地;石鼓路中段天主教南京教区建筑工地;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古“越城”地区建筑工地;瑞金路三号电线杆埋设工地、瑞金路西端北侧“金城超市”建筑工地;太平南路西侧江苏饭店北建筑工地、太平南路四象桥西南东王府园高层住宅工地;瞻园路南端金陵展览馆建筑工地、瞻园路西侧瞻园商厦建筑工地;莫愁路北端西侧江苏省中医院综合楼建筑工地;长乐路东口南侧“长乐花园”建筑工地;北京西路与云南路交界口建筑工地;解放南路与八宝东街交界处建筑工地;建康路南京中医院办公楼改造施工工地;集庆路和鸣羊街交界处南京军区干休所大楼工地;户部街和火瓦巷交界处江苏省京剧院扩建工程施工工地等。

蒙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的王志高等同志热情相邀,近年还参观过他们的中山路和太平南路交界处东南角及进香河路东原老虎桥监狱两处考古发掘工地。南京热心于研究古文化的民间人士还向我们提供了珠江路北兰园电子商城建设工地、弓箭坊、鼎新桥、西八府塘、大中桥环北市场、冶城北、升州路省交通厅建设工地等十多处建设工地的地层叠压情况和瓦当出土情况等。这些调查资料让我们大致了解到南京城区六朝瓦当出土及分布、地下六朝文化层分布、文化层深度、叠压状况。如在鼓楼以西(除石头城遗址外)、以北地区地层中基本不见六朝遗物,富贵山——北极阁一线向南,六朝文化层在今地表以下从北向南逐步加深,北京东路以南一片,在地下50厘米左右即可见到六朝地层,至珠江路以北一线,六朝地层已距地表约1米左右,在中山东路一线,六朝地层一般在地下2米多深处,有些遗存深埋地下8米左右,如正洪街、洪武南路东侧金宝花园工地地下8米左右还发现过东吴时代的砖结构建筑物。到了升州路一线,六朝文化层往往在地表下4、5米深处。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过去许多专家认为的六朝皇宫所在的今东南大学一带地下并未发现丰富的六朝文化遗存堆积层。六朝文化层的这种埋藏情况对了解当时都城的原始地貌以及人口分布和生活空间及文化堆积的关系等都有直接帮助。瓦当的分布也非常有规律,属于东吴时期的云纹、人面纹瓦当的分布空间最小,属于南朝时期的莲花纹瓦当的分布范围最大等等,这与六朝都城的发展过程是完全相吻合的。以上的考古调查工作也是促使我们对六朝都城展开研究的重要原因。

1998年开始,我们又先后调查、勘探或发掘了清凉山六朝石头城遗址、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栖霞区北家边梁萧伟墓阙遗存、栖霞山南朝石窟遗存等。在部分发掘地点也发现了一批六朝瓦当。在此过程中,目验了千余件出土瓦当实物,获得了有关南京六朝瓦当的类别、时代风貌、分期等方面的初步认识。与此同时,还得到过镇江古城考古所所长刘建国等先生的支持,观察了镇江地区出土的六朝瓦当实物资料。同时还在洛阳、盱眙、扬州、苏州、绍兴、宜兴、九江、成都以及南京郊县江宁、高淳等地调查六朝瓦当出土情况,以获得比较和综合研究的基础条件。1998年,笔者完成了《六朝瓦当初探》一文,并将拙作提交在宁召开的“六朝文化国际讨论会”,在该文中,把六朝瓦当分为云纹、人面、兽面、莲花、文字五类,并对它们的类别、型式、时代、源流等做了初步探讨。同时提出六朝瓦当“既承袭了原北方地区东汉时代甚至更早时代的某些风格,但又重在创新,形成了与平城、洛阳、邺城等同时

期北方都城瓦当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瓦当系列,从某个侧面体现了六朝建康的文化面貌,开启了中国瓦当艺术发展的新的时代风尚。”^①但是当时笔者对六朝瓦当的分期及涉及的多方面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到了2002年,才大体明白六朝瓦当复杂的内涵和大致的期别,陆续发表了部分成果^②。这本小书也是对笔者几年来六朝瓦当研究工作的一点总结,书中重点是分析南京出土的六朝瓦当之类型、谱系、期别以及文化意义,目的乃是为今后的研究奠一基础。毫无疑问,本书是许多同事和朋友支持的一份成果,在此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有关六朝瓦当的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文物考古界、收藏界人士以及一切感兴趣的同志从不同角度做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才可能解决。

四

文物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究明历史存在的真相和文化运动的轨迹,六朝瓦当研究的目的也在于研究六朝都城史和六朝文化史。

“六朝”是一个迷人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从西周时代还是东周时代开始,其统治中心长期都在黄河流域,尤其是今天的西安和洛阳(包括西周的丰镐、东周的洛邑、秦的咸阳、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两地。六朝时代,封建政权的中心第一次从传统的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南岸的青山绿水之间,空间的位移、时事的更替、文化的碰撞、人智的进步,必然导致社会格局的转型和文化形态的嬗变。这一时期,曾经极度专制的皇权一度衰弱,有较高学养的世族参与到中央政权中,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社会环境略显宽松,改朝换代、能者为雄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现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模式和隔代易主而官宦依旧的格局并存,这给了人们以更多的思考机会,一些新思维、新机制在萌芽在成长,文化多元化的局面在此时代背景下出现。外来的佛教获得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千古机遇,儒、道、玄、文、史各学也不甘示弱,不同的智慧、不同的声音互相激赏,各呈异彩,共同

① 贺云翱:《六朝瓦当初探》,摘要发表于《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东南文化》1998年9月。

② 贺云翱、邵磊:《南京出土南朝椽头装饰瓦件》,《文物》2001年第8期;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2003年第1期;《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文物》2003年第7期;《南朝都城建康莲花纹瓦当的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提交“百济初期物流系统和对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韩国首尔)论文,2003年5月完稿。

营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六朝都城建康在这段历程中既扮演了“华夏正统”的角色,又发挥了融汇不同文明、创造新态文化的作用,并借助特定的地位和不同渠道将这种文化成就传输到友好的邻邦,所谓“国际化都市”正是因其对不同区域文化的接纳和创新且还能对不同区域的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后而获得的桂冠。

“六朝”三百余年间,在南京这块土地上,在古建业——建康都城内,有独裁者为了至高权力而骨肉相残的酷烈场面;也有政治家为家国存亡而不舍昼夜,施尽心机的勤勉作为;有军事家不畏强敌,驰骋沙场,或坐镇京邑、指挥若定的豪情壮举;有文化人或为民谋略、周旋劳顿或不拘一格、啸散淡泊或器重人格、凛然正气的万千气象;也有宗教家或叩问魂灵、虔诚讲说、超度众生,或不顾险途、西行异域、求真传的苦心大志。在这里,南方的、北方的、中国的、海外的,上自皇帝宰臣,下至走卒贩夫,演绎了无数的人情故事,值得我们永久回味和对话。作为今天生活在六朝故都这座城市中的一员,有时候,手展史册,目验遗物,颂读之间,真的感觉到六朝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宛在身边,经常为他们所感动,为他们所惋惜,以致也经常产生似乎要“走进六朝”的冲动。

六朝时期无数的生灵、无数的活动、无数的故事,曾在南京这方土地上生存,为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都城空间上的一些细节,如都城的四至、宫城的位置、城市的布局 and 空间结构、不同人群居住的区域、不同组织机构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地点等等。空间关系对认识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社会运动形式和速度、现象与本质诸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况且,究明都城各种建筑空间的历史真相,对研究南京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城区不同区域的开发历程、考古资料性质以及加深对历史遗迹、历史地名的认识,乃至更准确地去把握文献资料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状态都有一定的价值。

为此,活的“六朝”消失以后,就不断有学者去探索首都建康(包括建业)的空间细节,其中最优秀的当推唐代人许嵩的《建康实录》,其后,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元代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等都是些非常成功的作品。明清以来,陈文述、陈作霖等著名学者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著述累累。民国以来,朱偕先生最先对六朝建康做了系统调查与研究,他的成果迄今仍有参考价值。1949年之后,蒋赞初先生、罗宗真先生、李蔚然先生、郭黎安先生、马伯伦先生、郭湖生先生、卢海鸣先生等以及韩品铮、吕武进、刘宗意、台湾的刘淑芬先生等,包括一些海外学者都发